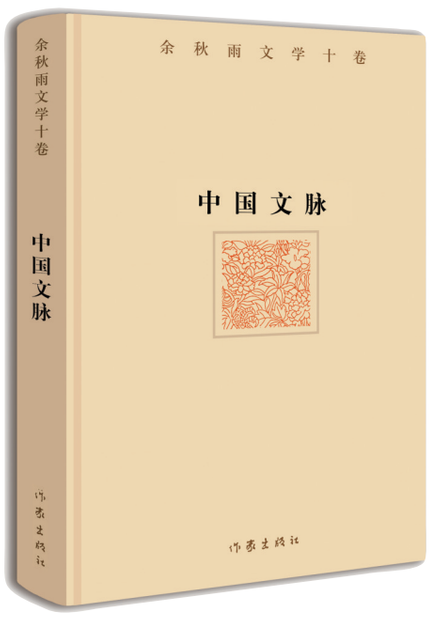
《中国文脉》新版自序

□余秋雨



《中国文脉》这本书，已经在海峡两岸出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发行量一直很大。这当然让人高兴，但我又产生了不少忧虑。

忧虑的焦点，在于对“文脉”这个概念的把握。本来，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安静的概念，但是由于我这本书的催化，近年来渐渐热闹。很多地区、城市、部门都在挖掘自己的“文脉”，连乡间村落，也找出了姓氏门庭中的“文脉”。

显然，这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

我提出“文脉”，是想为漫长而又庞大的中国文化寻得经脉。那是为群山辨认主峰，为众水追溯源流，必须严格选择，大做减法，而不是多多益善，大做加法。

这件事已经很着急了，因为近年来中国文化出现了大规模“痴肥”的不健康状态。原来在经济发展中认识到文化的价值，是一种重大历史醒悟，但是我们国家常有“一窝蜂”的毛病，转眼间已经到处是“文化”了。不分优劣、高低、真伪、主次、轻重、正邪，全都洋洋自得，千言万语，连篇累牍。这样的“文化繁荣”，必然会掩盖文化真正的生命支点，滑向虚浮和平庸。

很多急于了解中国文化的年轻人和外国朋友，近年来面对排山倒海的文化信号，都渐渐由期待而皱眉，最后都不得不转身，说是越看越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文脉是一种拯救。我要的文脉，是主脉，而不是碎脉；是大脉，而不是细脉；是正脉，而不是游脉；是定脉，而不是浮脉；是根脉，而不是散脉；是深脉，而不是皮脉。

那么，碎脉、细脉、游脉、浮脉、散脉、皮脉，是不是完全与文脉无缘？那倒也不。它们很可能是文脉的延伸状态、微观状态、变型状态、牵动状态，因此不能全然排除。但是，中国文化在醒悟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尽力找到主脉、大脉、正脉，并悉心把持住。

应该明白，在目前，真正让中国文化烦恼的，不是它的对立面，而是它的瞎帮手。这正像，在目前，对很多人来说，真正让身体烦恼的，不是营养缺乏，而是臃肿过度。什么时候中国文化也能像那些运动员一样，展现出精瘦的体型、健美的身材，那么，我们作为它的一分子，也就更会轻松从容、神定气闲了，而我们的下一代和远方的朋友们，也会更愿意与中国文化亲近了。

我曾多次在国际间讲述中国文化长寿的原因，在列出的八大原因中，第五项就是“简易思维”。我说中国文化的“第一原创者”老子恰恰是“第一清道夫”，用最简短的哲理形态使后代学者不敢把话讲啰嗦了。这就让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比较清浅、随意的状态，并由此长寿。我还根据对各大文明的考察得出结论：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秘至晦。

这一切，正是我写作《中国文脉》的基准。

在全书的编排次序上，有几个特殊问题需要交代一下。

第一篇《文脉大印象》是全书的引论，勾勒了中国文脉的简明轮廓，这也是我本人特别重视的一篇长论。一切繁忙而无暇阅读全书的朋友，读一读这篇引论也就能够领略大概。因此，这篇不短的文章曾被几家报纸刊登，又被那本专给忙人看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社会影响已经不小。于是我把这篇引论，单独作为全书的第一单元。

全书的第二单元是三篇奇怪的长文：《猜测皇帝》《感悟神话》《发现殷墟》。为什么是“奇怪”？因为它们并不是客观地从头讲述中国文脉，而是把我自己放进去了。

我在那三篇文章中回顾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发现中国文脉源头的惊险过程。

不知道古代那些大学者在青年时代凭着自己的单纯的生命与浩荡文脉初次遭遇时，产生过何等震撼。可惜他们都没有写出来，人们只能从他们后来终身不懈的投身中，推测初次遭遇时的异样深刻。我的情况与他们有很大不同，当时正陷于一场文化大浩劫，父亲被关押，叔叔被逼死，我因为在全面否定教育的大背景下投入了教材编写，又违禁主持一个追悼会，而被文化暴徒们追缉，只得只身逃到浙江奉化的一个半山避祸，幸好那儿有一个废弃已久的藏书楼。于是，灾难的大地、孤独的自己、古老的典籍，组成了一个寂静的“三相结构”，使我重头追问文化的本源。

这样，千古文化之脉与自己的生命之脉产生了一种悬崖边上的对接。这种对接惊心动魄，注定要重新铸造我自己的生命，并以我自己的生命来重新打理中国文脉。正是从那个悬崖边上开始，我的生命史与中国文脉史已经相融相依，无法分离。

当时我不知道，灾难的大地正面临着破晓时分，我自己的生涯也会迎来破晓时分，正巧，我在此时此地遭遇的中国文脉，也正是它数千年前的破晓时分。

——我认为这是一个颇有玄机的“大情节”，因此详尽地记述在三篇文章里。《中国文脉》把这三篇文章作为第二单元，使全书不再是一部严谨的教科书，而是成了一部“双向生命史”。

以前几家出版社的编辑，很想让这部书更具有教科书色彩，因此建议把这三篇文章放在全书的最后，作为“课余读本”。这个想法显然着眼于广大普通读者，我同意了，因此有几个版本是那样安排的。但后来仔细一想，觉得“双向生命史”比“单向教科书”更有深味，而且我后来的篇章，也都有自己的大幅度介入，仍然离不开“双向生命史”，因此，这次新版又把这三篇文章移到了前面。如果有些读者只想快速进入文脉，对于我避祸山间时的思维历程不感兴趣，那就可以在读了导论《文脉大印象》之后，跳过这三篇，直接去面对《老子与孔子》《黑色光亮》《稷下学宫》这些篇目，也就是从第一单元跳到第三单元。

不管怎么读，我都感谢了。

（摘自《中国文脉》，余秋雨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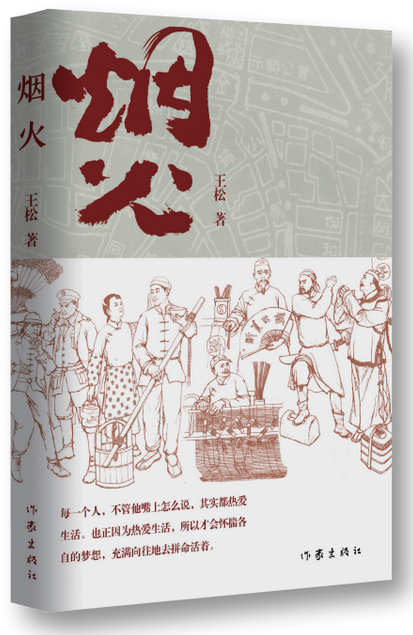
因为热爱，才有梦想

——我为什么写《烟火》

□王　松

当年，美国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摄《现代启示录》时曾说，他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带着观众去东南亚的热带丛林做一次探险旅行。当然，他做到了。我在看这部片子时，确实有一种跟随威拉德上尉走进热带丛林的感觉。虽然威拉德此行的目的是奉命去丛林深处寻找库尔兹上校，而我的目的，似乎就是做一次探险旅行。

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想起他不是因为这部电影，而是他曾经说过的这番话。我从一开始就想，写这小说，也权当是带着有兴趣的读者回到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游历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市井，在历史风云的笼罩下，也体验一下天津人曾经的生活。



但是，在我真写起来时，才发现，这事儿好像没这么简单。天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文化就摆在明面儿，你看得见，也摸得着，但就是无法用一两句话把它概括地说明白，就算本事再大的人，也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也听一些人说过，天津是码头文化，或殖民文化，或漕运文化，或商业文化乃至工业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且每种说法也都能举出证据。比如，我曾有一个中学同学，他从小说话就有个习惯，烙饼时翻过来，不说翻过来，说“划过来”，两人互相找，走岔了也不说走岔了，而是说“走向了”。他这样的说话习惯显然是受家里影响，他家是地道的天津人。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这些话，其实都与船家的禁忌有关。在河上使船，当然最怕“翻”，而水路上河汊如网，行船自然也最担心走岔了，所以才会躲着这些字眼儿。当然，如果说天津是别的什么文化，在方言中也同样能找出很多确凿的证据。可见，关于天津的这些说法儿似乎都对。可再细想，又好像都不完全对。其实这就对了。天津就是这样一个矫情的地方。一百个人看天津，会有一百种看法，也有一百种说法。而这一百种看法和说法，也都有自己的道理。当然，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真正的特质所在。

我前面说，这部小说真写起来时才发现，不是带着读者回到从前这么简单，是因为，我越写才越意识到，读者是不是真能回去，我不知道，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自己是真回去了，而且不是简单地去溜达一圈儿，而是真真切切地和这小说中的几代人一起栉风沐雨，似乎真的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百多年。说到这里，也就有些感慨。看来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寿命真是无限的，想要多长就有多长，只要他愿意，而且还活着，有思维能力，他的寿命就是发散的，借用几何的概念，不是射线，更不是线段，而是一条直线，两头儿都没有端点。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次陌生的“旅行”。我祖籍是北京，虽然在天津出生，在天津长大，这些年更多的时间也一直在天津生活，但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对北京比天津更了解，不仅是城市，也包括风物民俗乃至文化传统。可这一次，当我重回天津过去的一百多年，却发现，我对天津这个城市不仅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也很了解，所以有一种“重归”的感觉。

评论家王德领先生在评论这部小说时说，王松在此之前，好像并没认真打量过这个城市。这话确实说对了。这一次，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随着“穿越”回过去的一百多年，在北门外的侯家后一带穿大街钻胡同，和曾经的这些人一起生活，我渐渐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城市，也喜欢弥漫在这个城市街巷里那种特有的烟火气。

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哪儿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也正因为热爱生活，所以才会怀揣各自的梦想，充满向往地去拼命活着。但我要说，就热爱生活而言，天津人还要加一个更字。天津人的性格，也如同这座城市的文化，说起来可能有很多种说法，但这些说法放到一起就如同一个拼图，拼出来的，就是天津人这种热爱生活的习性。也正因为他们热爱生活，所以才具有了这样和那样的诸多方面的脾气秉性。

所以，说天津人幽默，天生喜欢相声，这是有着深层原因的。

当然，这座城市的文化也如此，同样是一个五颜六色的拼图。

一个朋友一天电话我，一张口就说，你这个写天津的小说我看了，写得挺哏儿，一看就知道，要不是天津的老爷们儿老娘们儿还真干不出这些事儿。一边说着就在电话里乐了。他当时说得无心，我却听得有意。这朋友的工作跟文学不沾边儿，也就是爱看小说，所以说话不考虑严谨，怎么想就怎么说。他所说的“要不是天津的老爷们儿老娘们儿，还真干不出这些事儿”，其实也就是天津人骨子里的这种独特的味道。让我欣慰的是，我把这种味道捕捉到了，所以才会让他有了这种感觉。这种所谓的独特味道就是，别管讲的是什么事，一听就能知道是天津人，用天津人特有的表达方式讲的，而这种特有的表达方式，也就是由前面所说的“拼图”决定的。味道足不足，地道不地道，就看你掌握这“拼图”的多少。

如果这样说，我觉得，这个朋友无意中说的这番话，还值得再想想。

对我来说，天津不是一本书。书在翻阅或研读的过程中，就算还没看到的部分，你也知道它的存在，总之，所有的内容都捧在手里，心里也就有数，只要一页一页地去读就是了。但天津这个城市不是。它更像地下岩层，只有钻探到不同的深度，才会发现不同的地质构造。没钻探到的地方，是无法臆想出来的。当然，这也恰恰是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

此外还有一点，每个人钻探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方式不同，也就决定钻探的角度不同。不一样的方式和角度，也就决定，发现的岩层构造也不尽相同。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都没跑出这个城市。

（摘自《烟火》，王松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卖木求书

□陈帮和

一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但有时命运却影响着对知识的获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读书，对大城市的儿童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但对偏远山区的穷孩子，却是难上加难。

在我小的时候，农村普遍贫穷，而我家因种种原因，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因此，读书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每到新学期，父亲都要为我们姐弟的学费发愁，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因欠学费被老师赶到教室外站着听课。偏偏到了小学五年级，已经识得一堆字的我疯狂喜欢上了阅读，看着其他同学花花绿绿的故事书，眼馋得不得了。

一次放学后，我把割猪草的背篼一扔，一定要父亲先答应给我买一本《十万个智斗故事》，才愿意去干农活。父亲瞪了我一眼：你没发烧吧，家里哪还有钱给你买书？

我说我不管，我就要故事书！

那天，从没打过我的父亲狠狠打了我一顿。我抽噎着哭了一晚上，第二天早饭都没吃就去上学了。我用这种幼稚的方式“对抗”着父亲。

原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忽然有一天，父亲叫住了我，说道：“星期天我和你表叔要去钟祥卖木头，你扛一根去吧，卖的钱给你买书。”

“真的？”我听闻喜出望外。

“真的！”父亲说。

钟祥是邻县一个镇，有一个热闹的木材市场。父亲和村民常把山里被风吹断的树木砍了，扛到钟祥卖钱。我们姐弟的学费，多数是这样凑来的。但从我家到钟祥，来回上百里路，要走将近十个小时，而且有很长的一段路在悬崖边，再加上木头也卖不了几个钱，所以稍有点门路的人，都不会去挣这个辛苦钱。

但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新书，对路途的艰险根本没放在心上。

二

星期六的晚上，父亲给我选好了一根看起来不大，但是很沉的柏木。为防止把我幼嫩的肩膀磨破，他特意在木头中段包了一层报纸。凌晨4点，父亲就把我叫醒了，我们三人顶着满天星斗出发。

前二十里路，全部是田间小道。稻叶和野草上的露水，很快就把裤角打湿，破烂的胶鞋也穿不住了，因为鞋里进了水脚下打滑，只得打着赤脚走路。

走完稻田路，就开始爬坡上坎。在一个悬崖嘴，我肩上的柏木不小心碰到一块突出的大石，我身子一下子失去平衡，连人带木就往悬崖下摔，幸亏我一把抓住旁边的小树。重新站稳后，我的脸变得惨白。

屋漏偏逢连阴雨。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一条恶狗猛地冲出来，直直地冲着我扑来，狠狠地咬了我的小腿一口，鲜血顿时染红了裤脚。柏木从肩上摔下来，我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怎么也不肯走了。父亲赶跑了恶狗，拈起地上的干土给我止住血，说：“那怎么办？不可能让你在这儿等我们啊？”

我只好再次扛起木头，一瘸一拐地上路。

快到11点时，我们接近了钟祥。路上不断有木材贩子问价，但我肩上那根柏木，却无人问津，显然是嫌短了细了。我的信心不断受到打击，心想，要是柏木卖不出去怎么办？是不是还得扛回去啊？

终于，有人问我的柏木怎么卖了。父亲说了一个价，那人连连摇头：“这根木头我拿来用处也不大，最多给一元。”父亲说：“娃儿扛了那么远的路，给一元也太少了吧？”

那人看了一眼正眼巴巴望着他的我，说：“这么小的娃儿，你也忍心让他扛木头……最多添五角！”此后任父亲磨破嘴皮，他也不松口。父亲看我实在走不动了，只好答应卖了。

但那人仔细检查柏木后，却不要了：“中间这么大一个朽洞，连桌腿都做不了，我拿来没用啊！”

柏木重新扛在我红肿的肩上，顿时变得重若千斤。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一路洒在烈日下的尘土中。

到了集市，父亲和表叔的柏木先后被人买走，而我那根柏木可怜巴巴地缩在一角，始终没人理睬。父亲陪着我蹲在柏木后面，我们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每一个走近的小贩。可是直到散场，柏木都没卖出去。

父亲无奈地扛起那根柏木说：“走，吃饭去。”

我没动，我还想着那本书。

父亲明白我的心思，说：“我们把木头存在一个地方，明天再来卖了买书。我兜里的钱是给你奶奶买药的，不能乱花。”

我哇的一声哭了！

父亲终于失去了耐性，说：“要不你扛着木头到书店去，看人家换不换书给你！”

父亲其实只是一句气话，但当时的我却认为真的可以这样换书，于是高高兴兴地扛着这根柏木，往对面的书店走去。

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当时的场景：卖书的阿姨看着一个穿着破烂、肩头红肿的小孩扛着一根长长的柏木来换书，先是吃惊，然后红了眼圈，不仅把书换给了我，还送了我半根油条。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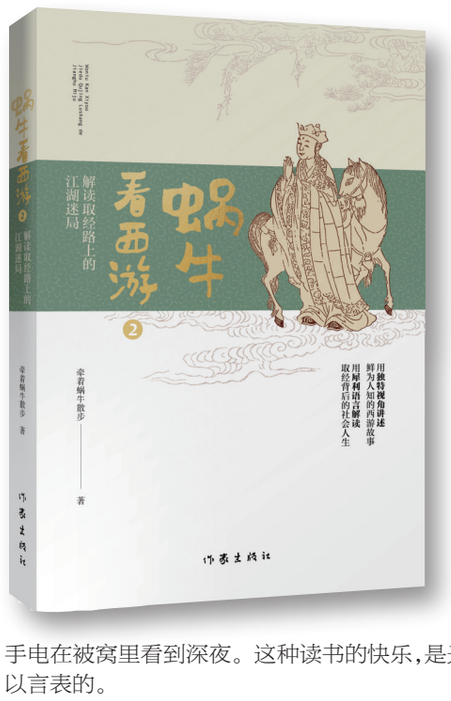
此后的日子，我又扛着柏木跟父亲跑了几次钟祥，不过再也没出现卖不出去的窘况。虽然每次回家还要光脚走四十多里山路，但边看书边走路，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往往还没到家，这本书就看完了。虽然第二天感到浑身酸疼，可仍期待着下次钟祥之行。

小学毕业时，我从那位卖书的阿姨手里买了一大摞《十万个智斗故事》，当然，幼嫩的肩上也增添了厚厚的茧疤。

今天的孩子，无法理解七八十年代农村孩子无书可读的悲哀。记得有一次放牛，我在垃圾堆里捡到半本小说（没有封面、开头和结尾），如获至宝，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多年后，才知道它叫《四世同堂》。

读初中时，同学家里有一套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要借得到他家里去取。来回五公里山路，还得替他承包一周打扫教室的任务。放学后，我打扫完教室去他家，边读边走回家时，天已黑尽，而此时我连中午饭也没吃。晚上，又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到深夜。这种读书的快乐，是无以言表的。



书读得多了，便开始尝试写些东西。终于有一天，文章变成铅字出现在了报纸上。记得我领到人生第一笔稿费十二元通知单时，激动得一天没吃饭，一晚上没睡着（真的吃不下、睡不着），血往头上冲，幸福得直发晕。

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知识是走向成功的阶梯。我靠着读书，走出了山区；靠着一支笔，有了今天的成就。

四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买书早已不用跑那么远的路，只需在手机上点两下，第二天快递员就能送到家门口。

甚至都不用买书，无论什么样的文章，网上总能搜索到免费版，不花一分钱，就能读到作家们熬更守夜写出来的作品。

读书越来越容易，可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家似乎都挺忙：小学生忙着补课，中学生忙着应考，大学生忙着找工作，上班族忙着赶地铁……每天这么累，哪有时间读书？好不容易有点儿零碎时间，那就打开手机刷刷短视频吧，顶多看看搞笑段子。

读书，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相信很多人买回去的新书，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也没读完。

文学青年成了愣头青的代名词，单纯的实体书店难以继续，写书的比看书的还多。

记得有次参加一位作家的新书发布会，他不停地作揖感谢大家读他的文章。在我小的时候，是读者鞠躬感谢作家们奉献了精神食粮。

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个时代。

如果没有购书网站，相信很多人还会像我当年一样卖木求书；如果没有媒体平台，相信我写的“西游”系列文章，读者也很难看到；如果没有网络评论，我也不能及时听到大家的批评意见，有针对性地弥补自己的知识缺陷……

网络改变着大众，也改变着作家。

正因为有粉丝们每天的督促，让我坚持三年解读《西游记》，每天更新文章雷打不动；正因为有粉丝在网上留言鼓励，让我坚持写了五百多万字获得全网十亿点击；正是为了方便读者网上阅读，我改变了以往的沉重文风，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深奥的道理。

时代在变，作家也必须变。唐诗衰落了，有了宋词；宋词没落了，有了元曲；文言文生涩，才催生了白话文。网络平台的兴起，给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但不管文体怎么变，载体怎么变，阅读习惯怎么变，文化传承不能变。

从2015年11月开始，我陆续在自媒体号“蜗牛看西游”上写了两千多篇文章，其中精品深度文二百多篇，2018年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实体书《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五十个谜团》，赢得了读者的喜爱，销量喜人。

在粉丝们的催促下，决定推出第二本新书。这里面的内容，同样经过了反复修改补充，以及出版社专业编辑的校正审核，比公众号上的网文更加丰富更加严谨。此外，每篇文章后还增添了网友留言，相信不少粉丝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名字。在此，对作家出版社以及这些热情留言的网友表示感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蜗牛在引用原著时，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为准，即便是通假字，也原样保留。关于佛道相争的内容，仅限于西游世界，与现实中的佛教道教无关，请勿对号入座。

（摘自《蜗牛看西游2：解读取经路上的江湖迷局》，陈帮和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